

※ 書目文獻 ※

臺灣大學圖書館藏海內孤本 《七真仙傳》考釋

吳光正^{*}

全真教為了建構教派認同、提升自身在教內外的地位，在元代展開了聲勢浩大的傳記書寫運動，其中，王重陽及其核心弟子的傳記書寫，在這一歷史書寫潮流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但苦於文獻不足徵，學術界一直未能清晰明瞭七真傳記的早期書寫情形。二〇一六年暑假，筆者撰寫〈宗教實踐與金元全真教的傳記書寫〉一文時，發現了《七真仙傳》的不少編撰、刊刻資訊，並從高萬桑、康豹的文章中獲悉《七真仙傳》尚存人間¹。二〇一六年十一月，筆者專程前往臺灣大學查閱、抄錄這一海內孤本全文。就在前往臺灣的前幾天，筆者赴山東參加學術會議，得知秦國帥先生已經獲得該書的序跋，並撰有一文，承蒙秦國帥先生信任，將序跋和論文悉數送我參考²。從臺灣大學查閱資料回來後，筆者將《七真仙傳》全文悉數回饋給秦國帥先生，細讀文獻，覺得還可以在秦文初步清理《七真仙傳》創作、流傳的基礎上做更細緻的考述，於是撰成本文，就正於方家。

一、創作進程和版本變遷考辨

臺灣大學圖書館珍藏的《七真仙傳》鈔本，包括王重陽及其六大核心弟子的傳

* 吳光正，湖北武漢大學中國宗教文學與宗教文獻研究中心珞珈特聘教授。

¹ 相關資訊可參閱康豹：〈撰寫歷史，創造認同：以《玄風慶會圖》為例〉，張廣保編，宋學立譯：《多重視野下的西方全真教研究》（濟南：齊魯書社，2013年），頁103。承蒙康豹先生進一步提供資訊，在此特致謝意。

² 秦國帥：〈七真仙傳與全真歷史：以臺灣大學圖書館藏《七真仙傳》為中心的考察〉，《世界宗教研究》，2017年第3期，頁104-114，有興趣的讀者可以查閱。

記，即〈重陽真君王祖師傳〉（共 21 頁）、〈丹陽真人馬宗師傳〉（共 22 頁）、〈長春真人丘宗師傳〉（共 32 頁）、〈長生真人劉宗師傳〉（共 10 頁）、〈長真真人譚宗師傳〉（共 10 頁）、〈玉陽真人王宗師傳〉（共 10 頁）、〈廣寧真人郝宗師傳〉（共 6 頁）。其排列順序和篇幅本身，已經表達了傳記作者的一種價值判斷。該鈔本正文前，依次列有鄒濟、杜道堅、宋渤、張本、李仁卿、李鼎、王鶚、彭志祖、路道通、趙龠、孟攀麟等寫的十一篇序跋。除宋渤和杜道堅序，其餘序跋均注明了寫作時間，但編排順序比較奇怪，即未按照撰寫時間順序編排。杜道堅序還提到正一教主張與材亦曾為《七真仙傳》作序：「觀我天師廣微真人敘曰：『子房先天下而後一身，七真先一身而後天下。』微兼志物我、玄同一心者，孰能道此語？」³可是，不知出於什麼原因，張與材的序已經佚失了。另據《玄元十子圖》黃仲圭序，路道通亦曾請他為《七真仙傳》和《玄風慶會圖》寫過著語，《玄風慶會圖》著語實際上就是序跋，保存於該書中，但《七真仙傳》著語卻未見於臺大圖書館藏《七真仙傳》鈔本中。這些現象及各序跋的內容顯示，《七真仙傳》的創作進程和版本流傳頗為複雜，需要仔細考辨。

《七真仙傳》的創作，經歷了一段頗為漫長的過程，彭志祖之序曾有明確而完整的記載：「《七真仙傳》，自河內張邦直子中為之，張本、北平王粹子正寔增飾之，太原李鼎之和又從而繼述之，前後歷二十餘稔，始克完備。」張邦直的《七真仙傳》寫於金亡之前，迄彭志祖作序的「至元戊辰（1268）三月十九日」已經三十多年，所以「二十餘稔」之「二」當係抄寫之誤。

《七真仙傳》的第一位作者張邦直，生平事跡可考者不多。劉祁（1203-1250）《歸潛志》卷五有其簡要資訊：張邦直，字子忠⁴，河內人。少工詞賦，嘗魁進士平陽。貞祐（1213-1216）南渡後，歷任國史院編修官、應奉翰林文字。性樸澹好學，尤善談論。在館五六年，從趙秉文遊。因丁母憂而出館，教學南京。「後南京被圍，闕食，余遇之富城西，敝衣檻樓可憐。已而，聞鶻卜天街，值一回鶻問卜，子忠以文語應之，為回鶻所毆。北渡，將還鄉，道病卒」⁵。劉祁《歸潛志》還提到張

³ [元]杜道堅：〈序〉，《七真仙傳》鈔本（臺灣大學圖書館藏）。本鈔本無頁碼，故引文無法標示頁碼。

⁴ 「子忠」，《七真仙傳》諸序作「子中」。

⁵ [金]劉祁：《歸潛志》，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編：《宋元筆記小說大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6冊，頁5941。

邦直與雷淵、宋九嘉同年，則中進士的時間為崇慶二年，即一二一三年。該書「王鬱」條還條列王鬱從遊最久者名單，中有張邦直。《全金詩》收錄其詩一首。

關於張邦直撰寫《七真仙傳》的情形，現在也只能做此簡單的推斷。李道謙《終南山祖庭仙真內傳》之「趙九淵」(?-1227)傳曾謂其鍾情方外：「迨壬寅(1182)丹陽仙仗東歸，先生往來終南鳳隴之間，徜徉自若也。河內張邦直尹扶風日，常延致其家，與之談道。每留數月，為方外忘形之交。」⁶據《甘水仙源錄》可知，他曾撰〈真常子李真人碑銘〉，末署「朝請大夫翰林修撰同知制誥賜紫金魚袋張邦直撰」。他在文中指出：「是道之傳，古所未有，倡始於重陽王君，門弟子得其傳者，馬丹陽玄寶泊其室孫清淨不二、譚長真通正、劉長生通妙、丘長春通密、王玉陽體玄、郝廣寧大通七人而已。」⁷另外，他還撰有〈王重陽祖師畫像贊〉：「贊曰：道之真以治身，而世之從事者多得其一，罕有得其全。自重陽子唱全真之道，馬丹陽輩從而和之，然後其教大行乎天下，而習他教者為□。嗚呼，其盛□□！故昔莊子休有云：後世之學□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為天下裂。惜不及見此公。翰林學士張邦直撰。」⁸由此可知，其撰寫七真傳記自有其宗教情懷。關於《七真仙傳》的成書下限，我們可以從《歸潛志》的成書加以推算。劉祁親歷一二三二年汴京的陷落，其後輾轉流離，於一二三四年回到家鄉，《歸潛志·序》寫於一二三五年季夏既望，交代了寫作緣起：「獨念昔所交遊，皆一代偉人，人雖物故，其言論、談笑，想之猶在目，且其所聞所見，可以勸戒規鑒者，不可使湮沒無傳，因暇日記憶，隨得隨書，題曰《歸潛志》。」⁹另，張邦直還曾撰〈真常子李真人碑銘〉，李真人即李志源，卒於一二三三年春。是則，張邦直應該卒於一二三三年春至一二三五年夏之間，其《七真仙傳》也應該在這之前完成。

《七真仙傳》的第二位作者張本為貞祐三年(1215)進士，《甘水仙源錄》和《中州集》小傳誤作貞祐二年。綜合二傳可知，張本字敏之，觀津人。幼年與李志常為同舍生，初志常之入道也，先生以嗣續規之，既知牢不可奪，乃各言所志而訣。一二一五年中詞賦高第，平生工於大篆及八分，作詩殊有古意。正大九年

⁶ [元]李道謙：《終南山祖庭仙真內傳》，收入《道藏》（北京：文物出版社、上海：上海書店、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9冊，頁522。

⁷ 李道謙集：《甘水仙源錄》卷4，收入《道藏》，第19冊，頁749。

⁸ 陳垣編，陳智超、曾慶瑛校補：《道家金石略》（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頁468。

⁹ 劉祁：〈歸潛志序〉，《宋元筆記小說大觀》，第6冊，頁5909。

(1232)，以翰林學士身分隨曹王使北，實為人質，因而見留，遂隱為黃冠。居燕京長春宮僅十年，時李志常掌道教，兄事如昔，盡禮給養之，後遊濟南，因病而化¹⁰。王鶚撰〈玄門掌教大宗師真常真人道行碑銘〉亦提到張本的類似經歷，謂李志常「兄事如昔，並其屬給養之」。張本這類情形，在蒙古滅金的過程中很普遍。王鶚在該文中就提到：「時河南新附，士大夫之流寓於燕者，往往竄名道籍，公委曲招延，飯於齋堂日數十人。或者厭其煩，公不恤也，其待士之誠類如此。」¹¹《中州集》存其詩十一首，第一首為〈得王子正書〉。除此之外，《甘水仙源錄》還收有其詩一首。

正因為這一經歷，張本為全真教撰寫了不少碑銘、序跋和傳記。據《甘水仙源錄》可知，他先後於一二三〇、一二三七、一二三八年撰有〈德興府秋陽觀碑〉、〈修建開陽觀碑〉、〈送真人于公如北京引〉。臺灣大學圖書館藏《七真仙傳》除了彭志祖之序提到張本曾增飾張邦直《七真仙傳》外，還收有他撰寫的序一篇，末署「歲次丁酉春上元日翰林遺叟納庵張本引」。張邦直亡故之後的丁酉年，有一二三七年和一二九七年。張本和李志常(1193-1256)同學，且一二四二年離開燕京，遊濟南而化，不可能活到一二九七年。是則，這篇序應該作於一二三七年，是張本增飾《七真仙傳》後為該書寫的序。該序引老子「道之真，以治其身」展開議論，謂：「重陽祖師出，繼得數君子，知我之與人共此真也，性域其情，志帥其氣，其踐履不遠，造次顛沛之際，慈儉不爭之化，往往庇及斯民。老氏之學，及先哲之所傳者，尚不墜云。」¹²

《七真仙傳》的第三位作者王粹(1202-1243)，字子正，北平人。據《甘水仙源錄》可知，王粹才高而學瞻，與世疏闊，不事舉業，金哀宗正大間(1224-1231)薄遊鄧下，入節鎮唐鄧之漆水公門下為客。蒙古兵南下，漂泊江漢間。一二三四年，楊彥誠被蒙庭之命召集三教醫卜等流，迎王粹至燕京。王粹拜李志常為師，居長春宮，一二四三年九月無病而逝（這一點和元好問所記有異）。「少有詩名，每一詠出膾炙人口」，「嗜讀書，作文尤長於詩，其五言雅淡，有陶韋之風焉」¹³。元好

¹⁰ 〈訥庵張先生事蹟〉，李道謙集：《甘水仙源錄》卷7，收入《道藏》，第19冊，頁785。

¹¹ 〔元〕王鶚：〈玄門掌教大宗師真常真人道行碑銘〉，李道謙集：《甘水仙源錄》卷3，收入《道藏》，第19冊，頁747。

¹² 〔元〕張本：〈序〉，《七真仙傳》鈔本。

¹³ 〈恕齋王先生事蹟〉，李道謙集：《甘水仙源錄》卷7，收入《道藏》，第19冊，頁784-785。

問《中州集》收其詩三十三首，其小傳謂其「正大末，用門資敘為南陽酒官。遭亂流寓襄陽。襄陽破，隻身北歸，寄食燕中，遂為黃冠師。有『十月風霜侵病骨，數家針線補殘衣』之句，親舊有憐其孤苦，欲為之更娶者。子正業已高舉，主太極道院，竟不自返。年四十餘，癸卯九月病卒。」¹⁴ 尹志平《葆光集》有〈遊五華五絕答王子正〉五首、〈答王子正〉一首、〈五華山寄王子正三絕〉、〈答王子正〉一首、〈西江月·贈儒士王子正〉一首，皆是勸道之作，可見，尹志平亦對王粹頗為關心。此外，《郝文忠公集》收有〈與北平王子正先生論道學書〉一文¹⁵。

關於其增飾《七真仙傳》的情形，除了《七真仙傳》各序外，相關碑傳亦有明確記載。李鼎序謂李志常於「辛丑(1241)壬寅(1242)間，俾王粹子正作《七真傳》，天不假年，未終其一而子正物故」¹⁶。〈怨齋王先生事蹟〉謂李志常「遇之甚厚，復以上世師祖本行屬之為傳，將藏諸祕笈以永其傳。先生遂居萃玄堂，研精致思、旁求遠索、細繹而編輯之」¹⁷。〈重陽成道宮記〉亦提到王粹撰寫祖師傳一事：「且祖師可見之跡，玉峰胡子金既已有贊，平水毛牧達有引，北平王子正有傳，『活死人墓』四字，又有趙翰林閑閑親筆，掌教真常真人跋語，並刻之石。」¹⁸ 該記為作者遵李志常之命而作，時間在一二五二年之後。《甘水仙源錄》收有王粹所撰〈七真贊〉，署「北平王粹子正述」，贊王重陽及其六大男弟子。其〈重陽王真人〉云：「出應道運，英雄絕倫。甘河得遇，兀若狂人。挈還四師，大開全真。巍巍法教，東海西秦。」〈丹陽馬真人〉云：「晚契奇因，盡捨家貲。千朝得道，三髻承師。風雷示化，金玉垂辭。邈矣前躅，如何可追。」〈長真譚真人〉云：「一見師真，痼疾頓愈。決烈入道，水雲為侶。歸櫬終南，聚徒洛土。教風既弘，蛻然高舉。」〈長生劉真人〉云：「童真之力，聖賢所扶。風姿秀異，洛市工夫。中遭厄鬱，所守不渝。聲名卒顯，被召海隅。」〈長春丘真人〉云：「猗歟長者，不可復得。三朝推尊，才學功德。潛此兵戈，遠涉西北。九九乃終，世人莫測。」〈玉陽王真人〉云：「幼遇玄庭，再禮重陽。飛傘送號，金蓮共芳。跡多神異，名動帝王。高山景行，千載雲光。」〈廣寧郝真人〉云：「雖出閭閻，獨喜林泉。兩詞一

¹⁴ [元]元好問編：《中州集》（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頁381。

¹⁵ 參考陸俊嶺編：《元人文集篇目分類索引》（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

¹⁶ [元]李鼎：〈序〉，《七真仙傳》鈔本。

¹⁷ 〈怨齋王先生事蹟〉，李道謙集：《甘水仙源錄》卷7，收入《道藏》，第19冊，頁784。

¹⁸ 〈重陽成道宮記〉，[明]佚名編：《宮觀碑誌》，收入《道藏》，第19冊，頁712。

衲，終始師傅。神示易祕，沃橋六年。化緣逆順，悉合自然。」¹⁹王粹於一二四〇年所撰〈神清觀記〉亦提到該觀宮宇有三清之殿、七真之堂。由此可知，王粹所謂「七真」不包含孫不二，與永樂宮重陽殿七真屬於同一性質，王粹的〈七真贊〉很可能就是為其增飾之《七真仙傳》而作。如果真是這樣，則就可以根據贊詞推測相關情節了。

《七真仙傳》的第四位作者李鼎為太原陵川人。李鼎，字之和。《（光緒）山西通志》卷十五「貢舉譜」謂其為金泰和中進士。章宗泰和年間（1201-1208）策士兩次，一在泰和三年（1203），一在泰和六年（1206），李鼎中進士的時間，到底在這兩年中的哪一年，待考。另外，元李冶《敬齋古今注》卷二曾引用其關於丹道的觀點，可知李鼎和為《七真仙傳》作序的李冶有往來。根據《甘水仙源錄》、《道家金石略》、《金元全真教石刻新編》可知，這位曾中進士的李鼎為全真教留下了大量的碑刻：〈終南山甘河鎮遇仙宮詩序〉、〈重修終南山上清太平宮記〉、〈大元重修古樓觀宗聖宮記〉、〈沖虛大師于公墓碣銘〉、〈重玄廣德弘道真人孟公碑銘〉、〈明遠庵記〉、〈洞神觀碑記〉、〈玉華觀記〉、〈沖微觀記〉、〈寧真觀記〉、〈長真觀碑記〉。這些碑銘均撰寫、立石於一二五〇至一二六〇年代，〈玉華觀記〉撰於一二七二年，足見李鼎乃一高壽之人。據此亦可推測，〈重陽成道宮記〉那位年近八十的作者可能就是李鼎，他在該碑記中亦曾透露，他瞭解王粹創作王重陽傳記的情形。王鶚〈玄門掌教大宗師真常真人道行碑銘〉還提到一二六二年張志敬「具狀其師之道行，及持虛舟道人李鼎之和所為傳」請他撰李志常道行碑銘。關鍵的是，這些碑記署名中大多有「虛舟道人」、「虛舟老人」之號，〈玄都至道披雲真人宋天師祠堂碑銘並引〉署名為「門人前進士虛舟野人太原李鼎」，文中謂：「予先師真人棄予而往矣，其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與予未始少別也。」²⁰由此可知，李鼎號虛舟，為全真高道宋德方門下弟子。宋德方羽化於一二四七年，李鼎入道當在這一年之前，是則李鼎在道門中的時間至少有三十年。

關於李鼎撰寫《七真仙傳》的情形，其自序有詳細說明：「誠明嗣教，越中統三年秋九月，令予繼成之，予不避續貂之悄（應為「誚」之誤）而不辭之者，蓋以子正、子中，文士也，所能形容者，道人身外所著之跡也，道人身中所得之事，三

¹⁹〔元〕王粹：〈七真贊〉，李道謙集：《甘水仙源錄》卷2，收入《道藏》，第19冊，頁740-741。

²⁰陳垣編，陳智超、曾慶瑛校補：《道家金石略》，頁549。

田上下、沖氣周流、靈風飄蕩、通關透竅、神物變態，鼎旨皆文士之所信不及者，又豈能形容哉？今日此事，天天（衍一字）不欲示之於人則已，果欲示之於人，予何辭焉？」該序末署「明年夏四月，虛舟道人李鼎序」²¹。中統三年秋九月為一二六二年九月，至第二年夏四月，李鼎修改該書的時間約為八個月。根據李鼎之序，其增飾修改的原因有二：一是張邦直所撰「略而未詳」、王粹所撰雖詳而未完；二是張、王所撰為文士之作，所記為道人身外所著之跡。由此可知，李鼎是以修煉有成之道士身分，撰述全真教祖的內在風神。

張邦直、張本、王粹所撰傳記應該是以稿本或鈔本的形式流傳於全真道眾之間，李鼎增補後的《七真仙傳》應該刊刻於一二六八年。該書一二六八年刻本共有五序，署名如下：歲至元乙丑日南至龍山樵李仁卿序、明年夏四月虛舟道人李鼎序、歲於關逢困敦暮春中澣日慎獨老人王鶚謹識、至元戊辰三月十九日門下金泉彭志祖稽首載（「再」之誤）拜書、至元元禩書云後三日云中孟攀麟敬敘。這五序的署名時間依次為一二六五年、一二六三年、一二六四年、一二六八年、一二六四年。其中，一二六三年為完成時間，一二六八年為刊刻時間。

李鼎增補本在元代還刊刻過一次。這一次又增加了「隆道沖真崇正法師教門高士當塗杜道堅序」、「上黨宋渤序」和「大德七年歲次癸卯春正月十九日全真門人中山路道通謹識」、「吳人趙龠跋語」。根據杜道堅序可知，正一派天師張與材也曾為此次刊刻撰寫序文，根據黃仲圭《玄風慶會圖·序》可知，黃仲圭亦曾為此次刊刻《七真仙傳》寫過序，可惜皆不見於今存鈔本《七真仙傳》。除路道通、趙龠跋提到路道通準備於一三〇三年梓行該書外，杜道堅和宋渤序均未署時間。根據路道通跋語可知，宋渤序是路道通請其撰寫於北方，然後攜之南遊。是則宋渤之序應該寫於一三〇三年之前。然則能否據此就確定重刊本刊於一三〇三年呢？未必！杜道堅序署名「隆道沖真崇正法師教門高士」。根據朱右〈杜南谷真人傳〉，杜道堅一三〇三年授杭州道錄、教門高士，一三一二年授隆道沖真崇正真人，一三一八年羽化²²。另，杜道堅序提到張與材亦曾為《七真仙傳》作序，張與材羽化於一三一六年。是則，張與材序應該寫於一三一六年之前，杜道堅序應該寫於一三一二年之後、一三一八年羽化之前；這一重刊本不該稱為大德刊本，應稱為皇慶延祐間

²¹ 李鼎：〈序〉，《七真仙傳》鈔本。

²² 〔明〕朱右：〈杜南谷真人傳〉，李修生主編：《全元文》（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50冊，頁648-650。

(1312-1318) 刊本。

值得一提的是，路道通南遊所刊《玄元十子傳》、《玄風慶會圖》、《七真仙傳》的刊本時間均存在類似問題。因為這三本書的作序者有不少雷同。路道通江南刻本有個特點，就是宋渤、杜道堅、黃仲圭均為其中的兩本乃至三本書寫過序，宋序和杜序均不署時間。《玄風慶會圖》有序六篇，署名如下：至元甲戌歲下元日筠溪道人夷山李道謙序、上黨宋渤序、大德甲辰暮春之初吳興趙孟頫書、後學隆道沖真崇正法師教門高士當塗杜道堅序、大德九年重陽日杭三茅堂灑掃黃仲圭稽首書、至元閏逢闍茂重九日法孫太華洞玄子史志經序於後。李道謙和史志經序為一二七四年北方初刊本序，其餘四序，趙孟頫、黃仲圭序分別寫於一三〇四、一三〇五年，宋渤、杜道堅序的寫作時間當和《七真仙傳》一致，因此現存《玄風慶會圖》不應該稱為大德九年刊本，應稱為皇慶延祐間刊本。《玄元十子圖》的序跋則更為複雜。該書現存《道藏》本，書前有四序跋，書後有二序跋。書前四序跋，分署「乙巳(1305)孟冬，嗣天師張與材書」、「大德戊申(1308)上元日書」(姚雲)、「大德丙午(1306)立春日正一弟子三茅堂灑掃黃仲圭鎮仲稽首」、「大德丁未(1307)六月甲子二十四巖道士黃石翁稽首書其後」。書後兩序，一為趙孟頫自序，時在至元二十三年元日，即一二八六年，《玄元十子圖》當完成於此時；另一序末署「大德丙午元日教門後學當塗杜道堅稽首恭書」。大德丙午即一三〇六年，此時尚未獲贈「隆道沖真崇正真人」，可見，杜道堅署名完全遵循身分。大德丙午立春日黃仲圭《玄元十子圖》序提到路道通曾以《玄元十子圖》、《七真仙傳》、《玄風慶會圖》求序於自己。前者再一次確認，《七真仙傳》杜道堅序的署名可以確定《七真仙傳》的刊刻時間；後者可以確認，路道通曾先後持此三書向同一名人求序。

李鼎《七真仙傳》再刊本再遭毀版，於是在一四一八年再次刊印。永樂十六年東魯鄒濟序云：「歲久板毀，嘉禾（今浙江嘉興）全真姚孤雲購得一編，藏之有年矣。一日，持贈同志雪川（今浙江湖州）沈友容氏，托以流通，同壽諸梓，功完，囑余為之序引。」²³關於姚孤雲和鄒濟生平，秦國帥有詳細考釋，不贅。

需要強調的是，臺灣大學圖書館藏《七真仙傳》為鈔本。該鈔本書末有一行毛筆字，內容如下：「同治丁卯秋八月醉夢中人秋龕購於鏡湖有文書林。」「秋龕」二字不太好認，《臺灣大學圖書館藏珍本東亞文獻：中國古籍篇》介紹該書時乾脆將

²³ [明] 鄒濟：〈序〉，《七真仙傳》鈔本。

此二字省略²⁴，導致學者引用該書來源時也逕行省略。

由於《七真仙傳》歷經四位作者的編撰、兩次毀版、三次刊刻，目前所見孤本又是一個鈔本，由此帶來版本演變上的許多謎團。首先，是無法確定該書具體情節出於四位作者中的哪一位之手；其次，是現存序跋沒有按照寫作、刊刻時間編排，從而為確定刊刻年代帶來困擾；再次，就是現存序跋中提到的許多內容在現存《七真仙傳》正文中沒有得到反映；第四，便是正文中增插了不少突兀情節。因此，有必要結合相關材料做一考辨。

關於《七真仙傳》的創作情形，已如上述。但四位作者創作之間的具體關係，相關文獻還是透露出一些痕跡，即虛舟道人李鼎應該讀過其餘三人的創作。李鼎〈重陽成道宮記〉提到王粹撰寫祖師傳一事：「且祖師可見之跡，玉峰胡子金既已有贊，平水毛牧達有引，北平王子正有傳，『活死人墓』四字，又有趙翰林閑閑親筆，掌教真常真人跋語，並刻之石。」²⁵則李鼎見過王粹之作可明。臺大圖書館鈔本《七真仙傳·廣寧真人郝宗師傳》云：「至於天長預告侯子真之火，恩州夜入王鎮國之夢，人之休咎，道之行否，兵革所臨之期，凡有言之於其前，莫不驗之於其後。史館張邦直子中所謂『驚動人之耳目，其徒往往能道之』，故不復著云。」²⁶則李鼎刪削張邦直之作可明。王鶚序謂李鼎「既受命，夙夜苦心，剔繁去冗，遂為成書，仍於傳後各立贊論」²⁷，可謂的論。又李鼎曾批評文士張邦直、王粹無法敘道人身中事，因此自己的增補旨在強化這方面的內容。這在現存鈔本《七真仙傳》的行文中有所體現。如：馬丹陽傳中有如下一段內容：「嘗為門人說『內天地』云：人能常清靜，天地悉皆歸。人膈之上為天，膈之下為地。若天氣下降，地氣上騰，上沖下和，氣自圓矣。又說『四體用』云：行則措足於坦途，住則凝神於太虛，坐則勻鼻端之息，臥則抱臍內之珠。又聯句云：水中焰進三丹結，火裏蓮生一性圓。學道男兒无我相，修真烈士沒人情。石女吹簫鸞鳳舞，泥龍入海虎龍和。玲瓏玉姹敲龍角，惺灑金童跨虎腰。」隨後有一句評論，曰：「此類甚多，蓋道人身中事也。」²⁸

²⁴ 張寶三主編：《臺灣大學圖書館藏珍本東亞文獻：中國古籍篇》（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3年），頁227。

²⁵ 陳垣編，陳智超、曾慶瑛校補：《道家金石略》，頁526。

²⁶ 參見《七真仙傳》鈔本。

²⁷ 王鶚：〈序〉，同前註。

²⁸ 〈丹陽真人馬宗師傳〉，同前註。

很明顯，這段內容就是李鼎所增補。

李鼎補輯本王鶚、李冶序，以及一四一八年鄒濟序均提到《七真仙傳》各傳均有李鼎所撰贊論。王鶚序云：「仍於傳後各立贊論，而且序之於前。」李冶序云：「況傳贊精確，仙語琅琅耶？諸君敘列，曲折備盡，然僕（走）復贅談其傍，亦側聽陽阿，從而和之耳。乃若虛舟『靈風飄蕩』、『變化日新』之說，此又玄中之玄。僕（走）雖老，尚獲一溉之益。」鄒濟序云：「七真仙傳者，金源史臣河內張邦直之所作也，元初北平王粹增飾之，全真誠明宗師復要太原李鼎繼述之，始克成書，其敘事有法，贊論得體。」可是，今存鈔本只有王重陽、馬丹陽、劉長生傳有贊，其餘四人之贊均付諸闕如。此三贊還出現於《金蓮正宗仙源像傳》中。該書編定於一三二四年，出版於一三二七年。是則，該書全抄了《七真仙傳》之贊。是以可以根據《金蓮正宗仙源像傳》復原《七真仙傳》其餘四人之贊。譚處端之贊云：「抱疾求師，雪寒無寐。春生兩足，道光四密。夜焚楮杳，曉臥衛州。驂鸞跨鶴，掉臂瀛洲。」丘處機之贊云：「巍巍長春，一簑煙雨。磻溪六年，雪山萬里。洪範丹書，為王者師。玉符金虎，演道明時。」王處一之贊云：「奇哉玉陽，顯異具載。石上談玄，空中飛蓋。星輝帝座，水沸春池。金冠既錫，拂劍東歸。」郝大通之贊云：「賣卜人間，回頭已早。瓦罐衲衣，語默皆道。雲迷查洞，水繞石橋。《易圖》一卷，千古寥寥。」²⁹ 這四贊的創作思路和前三贊的創作思路一致，即以四言韻語綜述讚揚傳主一生。由此，可以確認這四贊就是今本鈔本佚失的《七真仙傳》贊語。

問題是，張邦直和王粹亦曾為全真祖師作過贊語。張邦直曾為王重陽作像贊，並和畫像一起刻諸琬琰，李鼎之序曾引述該贊。王粹曾寫有完整的〈七真贊〉，為李道謙輯入《甘水仙源錄》，卻未被李鼎採入《七真仙傳》。另外，全真高道宋德方也寫有〈七真禪贊〉，載《鶴鳴餘音》。據此可推測，今存鈔本《七真仙傳》的贊應該是李鼎所作。另外，李冶序提到「虛舟『靈風飄蕩』、『變化日新』之說」，虛舟乃李鼎之號，而「靈風飄蕩」四字見於李鼎序，「變化日新」四字，卻不見於今存鈔本《七真仙傳》中。其中緣由，待考。

保留在鈔本《七真仙傳》各傳後的「論」，根據行文可以確定為李鼎所撰。王重陽傳「論」，撰寫者稱王重陽為「吾祖師」，符合李鼎的全真道徒身分。丘處機

²⁹ [元]劉天素、[元]謝西蟾：《金蓮正宗仙源像傳》，收入《道藏》，第3冊，頁373-379。

傳「論」中有「師之形化近四十年矣」一句，時間比較接近李鼎補輯《七真仙傳》的一二六三年。七真傳記各「論」均就某一事理展開論述，行文風格和撰述思路一致，應該出於一人之手。

臺大鈔本比較突兀之處有三。一是各傳所增入之七真封號；二是丘處機傳中增入的元世祖至元六年(1269)、武宗至大三年(1310)褒封全真教祖師、宗師的制詞。李鼎本《七真仙傳》完成於一二六三年，刊刻於一二六八年，不可能有如上內容。臺大鈔本丘處機傳，於傳末「師之歌文有《磻溪》《鳴道集》行於世」一句之前，插入「至元六年己巳正月世祖褒封制詞」、「武宗加封制詞」，行文頗為突兀。臺大鈔本王重陽傳、馬丹陽傳、劉處玄傳，於「論」後「贊」前插入元朝兩次褒贈封號，譚處端傳不僅於「論」後插入褒贈封號，而且還在傳末插入「歲己巳春正月，國朝崇贈長真雲水蘊德真人」一句。王處一、郝大通傳，於「傳」後「論」前插入「封贈見丘真君傳」、「追贈見於丘真君傳」一句。可見，這些褒贈封號是後加的，且和丘處機傳插入褒封制詞的時間一致。這些制詞和封號，應該是在一三一〇年後加進去，一四一八年明代刊本增插這樣的制詞明顯違礙。這也再一次證明，元代《七真仙傳》重刊本不可能刊於大德癸卯(1303)，應該刊於皇慶、延祐年間。

此外，臺大鈔本《七真仙傳》丘處機傳篇幅過大亦是突兀之處。該傳共三十二頁，超出王重陽、馬丹陽傳十頁，超出劉處玄、譚處端、王玉陽傳二十二頁，超出郝大通傳二十六頁。這些超出的篇幅，包括上述褒封制詞以及元太祖宣召丘處機制詞、丘處機奏帖、元太祖促行詔書、丘處機奏對元世祖問道之言。這些公文和奏言應該抄自《玄風慶會錄》等相關文獻，並做了縮略，在整個《七真仙傳》的行文習慣上頗顯突兀，其中一些內容可能是皇慶、延祐年間刊刻時所添加。

二、《七真仙傳》的創作語境和傳播效應考述

《七真仙傳》的編撰在兩代全真掌教的領導下展開，並得到了教團高道、教外高層士人的支持，卻經歷了四位作者、前後歷時三十餘年才完稿；一二六八年刊刻後遭遇毀版，又在四十多年後的皇慶、延祐年間，由全真道士再行募捐刊刻於江南，其背後的創作語境乃至刊刻語境，令人深思。

根據《七真仙傳》的序跋，可以知道，《七真仙傳》的編撰是兩代全真掌教主導下的宗教實踐活動。掌教李志常和張志敬的生平自不必在此介紹。協助《七真仙

傳》出版的道士亦是全真教的核心人物。請孟攀麟寫序的講師天緯即是畢生以撰述全真傳記為己任的史志經，他參與編撰的全真史傳有《老子八十一化》和《玄風慶會圖》。受張志敬之命繕寫梓行《七真仙傳》的彭志祖為張志敬弟子，曾撰有〈通真觀碑〉、〈浚州重修神霄宮碑〉、〈練真子王志淵墓誌銘〉等碑記，並曾為李鼎所撰〈洞神觀碑記〉書丹。根據碑刻署名，可知他曾被朝廷賜紫，賜號葆真大師，曾歷任長春宮玄學講經提舉、長春宮提點。至於在南方主導、協助刊刻《七真仙傳》的路道通、張與材、杜道堅亦非等閒之輩。張與材是正一派天師，杜道堅為茅山宗高道，宋亡之際曾入伯顏軍營，勸伯顏止殺用賢，元世祖詔其赴江南求有道之士，乃一丘處機式的高道。路道通為長春宮道士，南遊錢塘，以刊刻全真傳記為己任。觀其所刻《玄風慶會圖》卷一末尾所附助緣名單，可知路道通動員了南北道俗兩界的大批人士，支持自己的刊刻事業，其活動能力於此可見一斑。

金元之際，動盪的社會局面為《七真仙傳》這類全真教的傳記書寫造就了優秀的人才。《七真仙傳》的四位作者，如前文所述，張邦直、張本、李鼎均曾中進士，張邦直和張本曾入官翰林院，王粹亦為一代名士。他們在金元易代的動盪局勢中親近全真教，得到全真教的庇護，甚至最終出家成了全真道士。

為《七真仙傳》定稿作序的士人亦非等閒之輩，彭志祖序將之稱為「翰林諸先生」。王鶚為金正大元年進士，歷官應奉翰林文字、左右司郎中，扈從哀宗遷蔡，入元後官至翰林學士承旨。除《七真仙傳·序》外，他還為全真教撰有〈渾源縣真常子劉君道行記〉、〈棲雲真人王尊師道行碑〉、〈洞玄子史公道行錄〉、〈玄門掌教大宗師真常真人道行碑銘〉、〈玉陽觀記〉、〈重修大純陽萬壽宮之碑〉等碑記。孟攀麟為金正大七年進士，歷官陝州州判、靈臺令、省掾，入元後歷官京兆路提舉學校官、中書省經籍所□官兼陝西□元帥府□議官、翰林待制兼知制誥國史院編修官、翰林侍講學士。除《七真仙傳·序》外，他還為全真教撰有〈湛然子趙先生墓碑〉、〈重修真常宮碑〉、〈十方重陽萬壽宮記〉、〈玉真觀記〉等碑記，《甘水仙源錄》錄存其〈題甘河遇仙宮〉詩。李冶，字仁卿，欒城人。《元儒考略》有其小傳，謂其為金末進士，知鈞州。金亡不仕，流落忻崞間，聚書自樂。忽必烈在潛邸，招其詢問當時之人材以及治國之術。晚年家元氏，買田封龍山下，聚徒講學。忽必烈即位後，兩次徵召其出山，第一次以老病懇求還山，第二次就學士位，暮月以老病辭。宋渤，字齊彥，號柳庵，官至集賢學士。其父宋子貞為金太學生，東平行臺嚴實，用為詳議官，從此步入仕途，歷官右三部尚書、翰林學士、中書平章。

宋渤因此得以憑根腳步入仕途。除了為《七真仙傳》寫序外，宋渤還撰有〈重修天慶延壽宮碑〉、〈玄明文靖天樂真人李公道行碑銘並序〉、〈煙霞崇道宮碑記〉、〈白雲觀張真人道寬異碑記〉等碑記。

編刊《七真仙傳》的組織、創作、助緣陣容如此龐大，如此顯赫，足見全真教對該書的重視。如此陣容卻歷時三十年才完成，完成後又遭遇毀版，毀版後又再次在江南刊行，且得到道教各大教派、教內教外的支持，這背後肯定有不同尋常的因緣。綜合史料和《七真仙傳》各序跋和正文，筆者以為原因有二：一是，自李志常開始，旨在確立全真譜系和典範的神話建構運動；二是，自憲宗五年（1254）開始的佛道之爭，導致蒙元政府對全真教的打壓行動。

撰寫全真史傳是丘處機的遺願，李志常、張志敬以掌教身分為此展開了系列工作。一二二八年李志常撰成《長春真人西遊記》，一二二八年白雲觀繪製成《西遊記》壁畫，張志敬掌教後打算重繪《西遊記》壁畫，令史志經完成《玄風慶會圖》；在李志常的組織下，令狐璋和史志經撰寫了《老子八十一化圖》，並四處散發、刻繪；李志常還完成了《重陽王真人憫化圖》，作為永樂宮重陽殿壁畫的底本。與此同時，李志常和張志敬四處指導、鼓勵、支持全真碑刻的撰寫，如：〈長春真人本行碑〉是依據李志常提供的行狀而寫，〈重陽成道宮記〉就是受李志常之命而撰就，〈清和妙道廣化真人尹宗師碑銘並序〉是由張志敬立石，〈玄門掌教大宗師真常真人道行碑銘〉是依據張志敬提供的行狀和李鼎所寫傳記而撰成。《七真仙傳》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展開。張本、王粹均在戰亂後得到李志常的庇護，他們增飾張邦直《七真仙傳》跟李志常的仙傳撰寫運動密切相關，張志敬後來命李鼎增補，可謂克紹箕裘。關於這一點，《七真仙傳》的李鼎、彭志祖序跋說得很清楚：「長春真人嘗謂門弟子曰：『古之得道之人，見於書傳者，多略而不傳，失其傳者，可勝言哉？』夫世得道之士，皆予耳目之所親接者，暇日嘗集《全真大傳》，以貽後人。長春仙去，真常別以其未見其成書，嘗有惜哉之歎。」「生（「真」之誤）常真人，累荷皇朝之寵命，綱領天下之教事，宏闡玄蒙，增置道徑（「經」之誤），欲傳七真，留心積年。河內張子中，雖有所紀，簡而不略，北平王子正，二篇未終而下世。逮誠明崇（「宗」之誤）師嗣行教法，每念先師之遺囑，欲成夙志，時委太原李之和補輯，甫為完書。」³⁰

³⁰ 分別見李鼎：〈序〉、〔元〕彭志祖：〈序〉，《七真仙傳》鈔本。

但是，全真教的傳記書寫運動，遭遇佛道之爭而導致的政治打壓，從而使得傳記書寫和傳記刊刻一波三折。元憲宗五年佛道之間在和林御前就《老子八十一化圖》展開了一次辯論，李志常敗陣，朝廷下令焚毀偽經經版，退還佛寺三十七處。李志常是全真掌教中除丘處機外，和蒙元政府關係最密切的一位，在位十八年。但在佛道辯論中蒙受羞辱，心情鬱悶，佛道辯論結束後不久，便於一二五六年六月羽化，死後還遭遇掘屍之辱。元憲宗八年(1258)，佛道之間在御前展開第一次大辯論，以張志敬為領袖的道教一方慘敗，參與辯論的十八位道士被罰為僧人，被令焚毀道經四十五部，歸還佛寺二三七所。張志敬接任掌教時才三十七歲，在教內地位本來就備受非議，在佛道辯論中又受盡羞辱，其掌教工作之難可想而知，這也導致他英年早逝，於一二七〇年羽化。第二次佛道大辯論，發生在元世祖至元十八年(1281)，這次辯論導致宋德方主持編撰的《玄都寶藏》被焚燒。《七真仙傳》的編撰進程明顯受到這一政治打壓的影響：王粹、李志常羽化後，增補工作便被擱置，張志敬掌教後又啟動編撰工作，一二六八年刻板後不久，又在一二八一年的焚毀道經運動中灰飛煙滅。

面對層層不斷的打擊，全真教試圖通過書寫歷史來彰顯對社會的貢獻，以提升全真教的社會形象。張志敬於一二六二年令李鼎增補《七真仙傳》，就是這種考慮的結果，該書一二六八年版的相關序跋彰顯了這一寫作動機。這些序跋一再突顯張本序所謂「庇及斯民」的理念，其中說得最為透澈的是李冶。他梳理歷史上道教救世典範後指出：「而七真繼踵，疊為近世之救，所遇雖殊，其為救一也。自重陽始祖開真荃於金源氏正隆、大定之初，長春老仙翁（疑缺一「扇」字）真風於我國朝啟運建極之際，中間陶鑄群生，使之保合太和、各正性命，蓋千萬數。而俘虜之餘齒，凍餒之殘喘，狴犴之假息，所以起屍、肉骼、膏枯、已痛，俾人蒙安樂之福者，又莫得而周知。」³¹ 李鼎則在丘處機傳後發論云：「丹鳳一鳴，四海受清寧之賜；薰弦再奏，萬物成長養之功。我長春仙真之起，其氣象崢嶸有如此者。」³² 到皇慶、延祐年間再刻《七真仙傳》時，杜道堅以神來之筆概括了全真教的功業：「神仙勛業，出世高風，大丈夫功成名遂之事，凡民可望道而見哉！昔全真祖師重陽王君，有宰輔器，不屑世用，晚受洞賓祕語，得神仙道，首化丹陽，立全真庵，以寓

³¹ [元]李冶：〈序〉，同前註。

³² 〈長春真人丘宗師傳〉，同前註。

修心明道、全吾本真之旨。海上金蓮蓬萊一會，得全真心印者七人焉。帝王大宗師長春起而全真教立，繼先志也。修身以至天下，乃真乃普，雖不在咎夔之位，而致君堯舜，活我烝民，今猶賴之，此神仙勛業，凡民固不識也。」³³ 與此同時，這些序跋也不忘強調續任全真掌教，在繼承祖師救世理念上的貢獻，尤其讚頌主持《七真仙傳》增補工作的張志敬能夠克紹箕裘，如李冶序云：「長春上賓，清和勅藏之，真常發揮之，今而誠明布濩之，則夫七真之盛跡，炳如日月在天矣。」王鶚序云：「誠明成真常之志，使天下後學，得觀師真已然之驗，可謂知所先務矣。中統二年，朝廷賜真人號，其璽書曰『增光前輩，垂法後人』，誠明有焉。」³⁴ 李鼎甚至在〈長春真人丘宗師傳〉中插入了如下一段話：「乙酉春，師折梨花一枝，持賜玄寧居士張公去華。公重其賜，瓶以養之。至秋結實二十有四，無異其樹之生者，時以為祥。去華乃誠明之父也。師之寓意，微矣哉。」³⁵ 很顯然，這是在為張志敬接掌全真教做辯護。張志敬一二五六年接掌全真教，直到一二六一年才獲得朝廷敕封，獲得敕封的第二年，張志敬便命李鼎開展《七真仙傳》的補輯工作。由此可見張志敬對這一工作的重視，也難怪各序均要對其讚頌一番。

面對層層不斷的打擊，全真教試圖通過書寫歷史，彰顯全真教與蒙元政府的密切關係，以獲得政府的理解和支持。只要仔細閱讀元代全真教碑刻，就可以發現，全真教蒙受佛道辯論帶來的政治打壓後，在各地樹立起大量碑刻。〈長春宮碑銘〉、〈至大詔書碑〉、〈崇道詔書碑〉的樹立就是其中之典範。元成宗即位的當年，即一二九五年，全真掌教張志仙請立〈長春宮碑〉。姚燧撰寫的碑文引述了張志仙的請求：「臣之曾師長春子丘處機為全真，學於寧海之昆崙山。太祖聖武皇帝當斲金之十年，方事西域，聞其有道，自奈蠻俾近臣劉仲祿持詔求之。又急其見，而遲其來，繼俘以逐之，抽兵以衛之，與語雪山之陽。帝之所問，師之所對，如敬天愛民以治國，慈儉清靜以脩身，帝大然之，曰：『天遣仙翁以寤朕。』命左史書其言，又以訓諸皇子者。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已敕臣徐世隆，載諸靈應之碑。惟是太祖格天之年丁亥夏五，詔因其號，易所居太極為大長春宮，猶未有碑，至是六十九年，人已無知受名所自。不及今焉陛下昭代，曉之詞臣，俾刻金石，則益不白

³³ 杜道堅：〈序〉，同前註。

³⁴ 分別見李冶：〈序〉、王鶚：〈序〉，同前註。

³⁵ 〈長春真人丘宗師傳〉，同前註。

於將來也。敢昧死請！」³⁶張志仙用「敢昧死請」這樣的字眼來描述自己的上書，是因為其時焚經之厄尚未解除；而之所以要「昧死請」，是因為這樣的碑記書寫，有利於確定全真教與蒙元政府的關係，關乎全真教的命運和前程。明白了這一點，就會明白，《七真仙傳》為什麼會鋪陳成吉思汗徵召丘處機、催促丘處機啟行的詔書，也就會明白，為什麼《七真仙傳》在皇慶、延祐年間再版時要在丘處機傳中加入許多的褒封制詞，以及丘處機的進表了。

撇開全真教撰寫、刊刻《七真仙傳》的特殊現實政治動機，全真教的傳記書寫最本質的特徵，應該是確立修道樣板。鄒濟序就認為全真教「其教其書，誠修真之軌範，入道之階（「階」之誤）梯也」。可謂定論。

張邦直、張本、王粹、李鼎四人編撰的《七真仙傳》，完成後產生了巨大的傳播效應，此後的全真傳記或參考該書，或直接以該書為藍本，《七真仙傳》成為全真教的樣板教材，今略舉數端加以說明。

全真史家李道謙和史志經編撰全真年譜和傳記時，參考了《七真仙傳》。《七真仙傳》李治之序曾收入一二八八年編成、一二八九年出版之《甘水仙源錄》，題曰〈七真傳序〉；另外，一二七一年版《七真年譜》後序引用了如下一段話：「然則七真之救世也，真叶上帝之心也；上帝之愛民也，真藉七真之教也。不然，何為天生聖皇，出寧四海；天生長春，左右大命；相與聚精會神，而同始共終哉？」這段話出自李治〈七真傳序〉。很顯然，李道謙編撰《七真年譜》時，參考了李鼎補輯之《七真仙傳》。李道謙在《七真年譜》中還提到自己參考了王粹所撰祖師傳記，其記「王重陽出生」條和「二十七歲應試武舉」條有「按北平王粹所撰傳云」、「按傳」等字可證。另外，史志經一二七四年出版的《玄風慶會圖》「附友汴梁」條亦用「按北平王粹作〈祖師傳〉云」的方式引述了王粹所撰全真祖師傳的資料。很顯然，《七真仙傳》中王重陽傳在王粹手上已經定型，所以李道謙、史志經參考該傳時直接標明王粹的著作權。

浮雲山聖壽萬年宮道士趙道一編撰《歷世真仙體道通鑒續編》時，基本上照單全收了《七真仙傳》的內容，刪除了《七真仙傳》的所有論贊。為增讀者信任，還是抄錄一段作為證明。《歷世真仙體道通鑒續編》「郝大通」條全抄自《七真仙傳》，連如下文字也照章全錄：「至於天長預告侯子真之火，恩州夜入王鎮國之

³⁶ 陳垣編，陳智超、曾慶瑛校補：《道家金石略》，頁720。

夢，人之休咎，道之行否，兵革所臨之期，凡有言之於其前，莫不驗之於其後。史館張邦直子中所謂『警動人之耳目，其徒往往能道之』，故不著云。」³⁷ 筆者在前文已經指出，這段話體現了李鼎對張邦直之作的刪削，趙道一也不做修改，而全部抄錄。可見，趙道一編撰《歷世真仙體道通鑒續編》時旨在保存文獻，並未對原始文獻做過多增補刪改，《歷世真仙體道通鑒續編》對於《七真仙傳》鈔本具有校勘價值。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鑒續編》本七真傳記值得注意者有三：一是，王喆傳後有一段議論，以「臣道一曰」的方式出現。這在趙道一三書各傳中，是唯一一處出現論的地方。二是，七真各傳均輯錄有至元六年褒贈封號。三是，丘處機傳無元廷兩次褒封五祖七真制詞和丘處機奏帖。這第三點說明，《七真仙傳》皇慶、延祐年間刊本並沒有這些內容。《歷世真仙體道通鑒》卷首趙道一序和進表均未署時間，但劉辰翁、鄧光薦序所署時間為一二九四年。《歷世真仙體道通鑒續編》有趙道一跋文一篇，亦未署年月。是書所記道人，始於王喆，終於金蓬頭，金蓬頭羽化於一二七六年。《歷世真仙體道通鑒後集》所記女仙、女道士始於无上元君，終於孫仙姑，無序跋。孫仙姑傳提到「至元己巳正月，褒贈清靜淵貞順德真人」。據此，可知《歷世真仙體道通鑒續編》完成於一二九四年後，趙道一所據《七真仙傳》版本應該是《七真仙傳》一二六八年刻本，一二六九年褒贈封號或為趙道一所加。

編定於一三二四年、出版於一三二七年的《金蓮正宗仙源像傳》也參考了《七真仙傳》。該書係劉志玄與謝西蟾「相與博搜傳記，旁及碑碣，編錄數年」而成³⁸。從其輯錄《七真仙傳》贊詞來看，他們顯然參考了《七真仙傳》。不過，劉天素在自序中強調自己在長春觀隨侍孫德或時「得觀列聖詔書，謹錄鈐梓以示四方」³⁹。則劉志玄所參考的《七真仙傳》當不是皇慶、延祐年間的再刊本，而是一二六八年初刻本。

如果將《七真仙傳》各傳記放置於金元七真碑銘傳記的寫作史上加以考察，就會發現一個驚人的互文性碑銘傳記建構史。在分析互文性之前，且先看看金元全真教神話建構運動所催生的七真碑傳。

³⁷ [元]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鑒續編》卷3，收入《道藏》，第5冊，頁431-432。

³⁸ 劉天素：〈金蓮正宗仙源像傳序〉，收入《道藏》，第3冊，頁365。

³⁹ 同前註，頁369。

王重陽	馬丹陽	譚處端	劉處玄	丘處機	王處一	郝大通
金源璫：終南山神仙重陽真人全真教祖碑（1226年）	張子翼：丹陽真人馬公登真記（1185年）	金源璫：長真子譚真人仙跡碑銘（改葬時作）	秦志安：長生真人劉宗師道行碑（1244年之前）	李志常：長春真人西遊記（1228年）	秦志安：金蓮正宗記（1241年）	秦志安：金蓮正宗記（1241年）
劉祖謙：終南山重陽祖師仙跡記（1232年）	秦志安：金蓮正宗記（1241年）	秦志安：金蓮正宗記（1241年）	秦志安：金蓮正宗記（1241年）	陳時可：長春真人本行碑（1228年）	七真仙傳（1268年）	七真仙傳（1268年）
李志常：重陽憫化圖（1256年前）	七真仙傳（1268年）	七真仙傳（1268年）	七真仙傳（1268年）	秦志安：金蓮正宗記（1241年）	姚燧：玉陽體玄廣度真人王宗師道行碑銘並序（1287年）	徐琰：廣寧通玄太師道行（1286年）
秦志安：金蓮正宗記（1241年）	王利用：全真第二代丹陽一無為真人馬宗師道行碑（1282年）			姬志真：長春真人成道碑（1268年之前）		
姬志真：重陽祖師開道碑（1268年之前）				七真仙傳（1268年）		
七真仙傳（1268年）				史志經：玄風慶會圖（1274年）		
				李道謙：全真第五代宗師長春演道主教真人內傳（1281年）		

根據上表可知，王重陽、劉處玄、譚處端、丘處機的道行碑創作於《七真仙傳》定稿完成之前，馬丹陽、王處一、郝大通的道行碑創作於《七真仙傳》定稿完成之後，丘處機的兩部重要傳記又創作於《七真仙傳》定稿完成之後，包含七真傳記的《金蓮正宗記》，創作於《七真仙傳》定稿完成之前。不過，《七真仙傳》的創作從金末到出版歷時三十年，其稿本又早於大部分碑傳。只要仔細比對這些文獻，就會發現它們之間，具有強烈的互文性，互相參照、承襲乃至抄襲的痕跡非常明顯。

比如，李志常《重陽憫化圖》和《七真仙傳》之〈重陽真君王祖師傳〉，均是在承襲此前碑銘和文集的基礎上撰作而成。〈重陽真君王祖師傳〉還是李志常命王粹增飾張邦直所寫傳記而成，或者李志常就是在參考王粹所作的基礎上完成《重陽憫化圖》。因為這兩部傳記的大部分情節基本相同，甚至連故事的順序均基本相同。姑以永樂宮重陽殿壁畫榜題和畫面來和〈重陽真君王祖師傳〉做一比對：誕生咸陽、下現金蓮、傳授密語、遇真甘河、南時作居、屏棄妻孥、甘河易酌、躬植海棠、題壁付圖、劉將（「蔣」之誤）焚庵、會真寧海、分梨環堵、長春入謁、長真棄俗、度太古、太古傳衣、太古傳衣（實為度王處一）、開烟霞洞、叱昆崙石、立會三州、投冠蓬海、釣小張哥、化長生子、卻介官人、警丹陽子、付史風仙、然薪觀節、會紇石烈、南京升霞、三師勘符、四子捧柩等情節和〈重陽真君王祖師傳〉基本相同，〈重陽真君王祖師傳〉提到王喆用天堂地獄警示、誘惑馬丹陽夫婦，《重陽憫化圖》則用了看彩霞、擎芝草、口梁、扶醉人、夜談密旨、撥雲頭、灑淨水、起慈悲、念神咒、誓盟道戒、畫示天堂等畫面加以鋪排。至於留頌邙山、別河辭嶽、沃雪朝元、嘆骷髏、妝伴哥、咒鹵井、散神光、擲蓋龍泉、權瘞孟園、秦渡論志、會葬祖庭、重現文登等畫面情節，則可以在之前的相關碑銘中找到線索。唯一特別的地方就是發蒙四子，只能在宋德方的〈全真列祖賦〉中找到依據⁴⁰。

再如丘處機之傳記書寫，各碑傳之間的承襲亦非常明顯。陳時可的〈長春真人本行碑〉是根據李志常提供的行狀撰寫，由於陳時可年老倦於執筆，所以其所撰〈長春真人本行碑〉除了開頭結尾以及銘辭外，完全照抄李志常所寫行狀。此後，

⁴⁰ 王重陽度化馬丹陽夫婦的部分情節不見於《重陽憫化圖》，卻見載於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鑒後集》孫仙姑傳。根據《七真仙傳》和《歷世真仙體道通鑒續編》男七真傳記的比勘，可以發現趙道一的七真傳記完全抄自《七真仙傳》，因此可以推斷《歷世真仙體道通鑒後集》孫仙姑傳的材料也來自早期全真仙傳。

李志常的《長春真人西遊記》和陳時可的〈長春真人本行碑〉又成了秦志安《金蓮正宗記》、《七真仙傳》、史志經《玄風慶會圖》的材料來源。《七真仙傳》出版後，李道謙又撰成〈全真第五代宗師長春演道主教真人內傳〉，作為附錄收入史志經《玄風慶會圖》，最後於至元十八年二月既望刻諸琬琰。將《七真仙傳》之〈長春真人丘宗師傳〉和〈全真第五代宗師長春演道主教真人內傳〉細加比對，發現除個別情節和字句稍有差別外，後者之情節和前者基本相同，是在前者之基礎上稍加編輯而成。李道謙本人也不避諱這一點，並在該傳末署曰「門下法孫天樂子李道謙齋沐謹編並題額」。

再如，作於《七真仙傳》定稿完成之後的馬丹陽、王處一、郝大通的道行碑，無疑參照了《七真仙傳》的情節。不贅。

從上述比對中不難發現，全真教七真碑傳的書寫，儘管經歷了眾多作者之手，但各碑傳之間具有強烈的互文性，所有素材均淵源於權威敘述，且互相沿襲。換句話說，全真教的碑傳具有內在的規定性和統一性，共同樹立起了一個個典範的高道形象。這種互文性所確立的典範效應，在《全元文》、《全元詩》、《全金元詞》、《全元曲》中亦有明顯體現，限於篇幅，容待將來另文闡述。

三、小 結

《七真仙傳》歷經四位作者，歷三十餘年才定稿，定稿前以稿本流傳，定稿後歷經三次刊刻，最後以鈔本流傳至今。初稿由張邦直完成於金末，其完成下限為一二三三年春至一二三五年夏，但由於「略而未詳」，導致張本、王粹和李鼎的一再增飾和刪改。張本的增飾本應該完成於一二三七年，其序可證。王粹和張本之間有詩詞唱和往來，於一二四一、一二四二年間受全真掌教之命，收集材料接手增補《七真仙傳》，其〈七真贊〉顯示其對全書有通盤考量，可惜未完工而病卒於一二四三年九月。不過，其中的王重陽傳已經定稿，流傳於全真高道之間，甚至被刻諸琬琰。李鼎於一二六二年九月開始《七真仙傳》的補輯工作，到一二六三年四月完工，歷時八個月。仔細分析李鼎增補本，可知該增補本的論、贊為李鼎所寫，其對正文的增補、刪削在正文中也有跡可尋。這一定稿本於一二六八年刊刻，但一二八一年佛道大辯論導致的焚毀《道藏》運動，使得該書刻板灰飛煙滅。這一定稿本在皇慶、延祐年間再次刊刻，各傳插入了元世祖和元武宗的褒贈封號，丘處機傳甚至

插入了元世祖、元武宗褒封全真祖師的制詞以及丘處機奏帖。皇慶延祐再刊本由於歲久板毀，於明代由全真道士姚孤雲委託沈友容重新刻板流通，這一刻本目前只存鈔本，乃醉夢中人秋龕於同治丁卯秋八月購於鏡湖有文書林，這就是珍藏於臺灣大學圖書館的孤本《七真仙傳》。這個鈔本佚失了兩篇序和四篇贊，不過贊還可以在《金蓮正宗仙源像傳》中找到。

《七真仙傳》的四位作者身分頗為顯赫，卻在金元之際親近全真教、得到全真教的庇護，甚至出家做了全真道士。張邦直、張本、李鼎中過進士，張邦直和張本還曾供職翰林院，王粹雖無意仕進但詩名滿天下；金元易代之亂改變了他們的人生軌跡，從此顛沛流離，張邦直、張本、王粹均因病而化，只有李鼎享年甚高，可能活到九十餘歲。全真教接納了他們，張本、王粹在長春宮隱為黃冠，張本得到全真掌教——當年同學李志常的厚遇；王粹則乾脆拜李志常為師，主太極道院；李鼎則拜宋德方為師，寄跡全真教三十餘年。

《七真仙傳》總計有十三篇序跋，其中張與材、黃仲圭序已經佚失。這些序跋作者的身分亦頗為顯赫。稿本一序，作者張本為金代進士，入官翰林院。定稿本五序，其中《七真仙傳》作者李鼎為金代進士，梓行者彭志祖為長春宮提點，李仁卿、王鶚、孟攀麟均為金末進士，入元後均曾或長或短地供職翰林院。皇慶延祐刊本六序，除趙龠身分待考外，張與材為正一派天師，杜道堅為茅山宗高道，路道通為長春宮高道，黃仲圭為正一派道士，宋渤為元代翰林學士。明代刊本一序，作者鄒濟官至中順大夫詹事府少詹事，因捲入皇室帝位繼承之爭而被免職。由此可見，《七真仙傳》的刊刻得到道俗兩界高層、道教各派高層的鼎力支持。

如此顯赫、龐大的編撰，刊刻、助緣陣容是通過全真掌教李志常、張志敬和全真高道路道通、姚孤雲的精心組織而形成，這說明《七真仙傳》的編撰在全真教內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透過該書編撰語境、刊刻語境和傳播效應的分析，發現《七真仙傳》的編撰彰顯了全真教的權力擴張和利益訴求。全真教把歷史書寫當作建構宗教譜系、確立教門典範的一種權力擴張形式，因此，七真的各類碑傳，無論是創作於《七真仙傳》之前，還是創作於《七真仙傳》之後，都嚴格遵循統一的敘述腔調，甚至完全沿襲乃至照抄此前的創作。七真碑傳的這種互文性，說明全真教傳記書寫具有內在的規定性和統一性，彰顯了全真教透過宗教書寫進行神話建構的努力，全真教碑傳因而成為「修真之軌範、入道之楷（「階」之誤）梯」！因此，《七真仙傳》的撰寫者和助緣者紛紛突顯金元之際七真之救世活動，將他們的濟世行為

稱為「陶鑄群生」、「丹鳳一鳴」、「薰弦再奏」、「神仙勛業」、「出世高風」。《七真仙傳》的撰寫和刊刻，遭遇蒙元統治者藉助佛道爭衡，擠壓全真教權力空間這一漫長而空前的政治災難。因此，全真教將歷史書寫當作一種利益訴求，藉此拉近與蒙元政府的關係；不僅在傳記中突顯丘處機與成吉思汗的關係，抄錄成吉思汗詔書和丘處機奏言，而且在重刊該書時將蒙元政府褒封全真教宗師的制詞、丘處機的進表插入丘處機傳中。明代建國後尊禮正一教，打壓全真教，置身明代國家宮觀——朝天宮的全真道士姚孤雲，刊行《七真仙傳》恐怕也有政治方面的考量。關於這一點，筆者將另文處理。總之，全真教將歷史書寫作為一種權力擴張和利益訴求，試圖在全真教內部、道教各派內部、道俗之間、政教之間建立宗教認同，達到吸納徒眾、教育徒眾、確立地位、尋求支援的目的。《七真仙傳》漫長的創作、刊刻、流傳歷史表明，他們的目的確實達到了。

全真教傳記書寫的這一特質，決定了《七真仙傳》在全真教文獻中的重要地位。作為一種樣板，它宣示了全真教的意圖和訴求，據此可以對其他全真教傳記文獻的文字敘述乃至文本意圖，做出準確的判斷，《七真仙傳》因此成為瞭解全真教早期歷史的權威文獻。由於大量的全真教文獻承襲乃至抄襲《七真仙傳》，《七真仙傳》還具有重要的校勘價值。尤其是《歷世真仙體道通鑒續編》七真傳記基本照抄《七真仙傳》，二書可以互校，從而校正手民、抄手之誤。這也可以確定《歷世真仙體道通鑒續編》對來源文獻採取了「照章輯錄」的態度，可為該書的校勘整理確定重要的原則。

由此可見，這一海內孤本的發現，對於全真教研究價值頗大。